

回首“文革”

上

张晔化晔苏采青晔主晔编
郑晔谦晔王寅城晔副主晔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北京

回首“文革”

下

张晔化晔苏采青晔主晔编
郑晔谦晔王寅城晔副主晔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北京

目摇摇录

上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代序).....	胡摇绳(员)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乔木(苑)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邓力群(员)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节录)	胡摇绳(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节录)	龚育之(猿)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郑摇惠(缘)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龚育之(愿)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席摇宣(怨)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	
摇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石仲泉(员)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席摇宣(员)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林蕴晖(员)
《五·七指示》初探	王禄林(员)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席摇宣(员)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杜摇蒲(员)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节录)	郑摇谦(员)

下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李雪峰(远猿)
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远怨)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穆摇欣(远猿)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摇——从“远·愿”事件到“苑·圆”大会	李雪峰(远猿)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贺摇源摇张沱生(远怨)
红卫兵运动述评	印红标(苑圆)
“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苏采青(苑猿)
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年一(苑苑)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	
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唐少杰(苑猿)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苑怨)
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曾摇涛(愿猿)
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	赵国勤(愿怨)
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摇化(愿猿)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摇峰(愿苑)
“革命委员会”始末	关海庭(愿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及评价	(愿苑)
愿苑年中苏边界冲突 缘起和结果	李丹慧(怨猿)
九大评述	金春明(怨猿)
略论党的九大后的整党	金春明(怨苑)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郑摇谦(怨猿)

195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张保军(怨怨)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 分歧和矛盾	刘志男(怨怨)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苏采青(怨怨)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摇德(怨怨)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汪东兴(怨怨)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 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怨怨)
十大评述	谭宗级(怨怨)
“批林批孔”运动	王海光(怨怨)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怨怨)
“组阁”之争	力摇平(怨怨)
邓小平与 怨怨年的全面整顿	张沱生(怨怨)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 怨怨年文艺调整述论	夏杏珍(怨怨)
怨怨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程中原(怨怨)
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 摇——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摇化(怨怨)
四五运动述评	金春明(怨怨)
“四人帮”覆灭记	范摇硕(怨怨)
后摇记	(怨怨)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

(代序)

胡绳

讲建国以后的党史时,人们常感到,一头一尾容易,中间不好办。头七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其中虽有一些问题可能引起争论,但总的说来好处理。近 15 年,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也很复杂,但是好办,总是改革成功嘛。中间这 15 年却不好办,难讲。但是这段历史不是不可理解的,这 15 年历史对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 15 年历史,我简单讲几句话。

先说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平同志讲过,有了“文革”的教训,我们才懂得必须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所以能产生这条新的路线,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迅速形成共识,很大成分是由于“文革”把“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给人以痛切的教训的原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文革”的教训好好地说清楚。从理论上实际上说明“文革”的错误,使大家认识中国再不能重犯“文革”或类似“文革”这样的错误。既然已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把这一段反面经验好好利用,那就

* 本文是作者 1981 年 8 月 15 日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节录。

可惜了,白作了牺牲。这个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很好的教训。与此同时,我提出一个看法,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我认为应该把它讲清楚。从领导层说,最明显的是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反“文革”的表现。“文革”一开始,因为有党的威信,有毛主席的威望,所以大家顶多是说不理解,渐渐地发生了怀疑,以至形成反对的倾向。反对的倾向是用各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些老同志是以“二月逆流”那样的形式表示反对,周恩来同志作为国家总理采取了各种办法,实际抵制“文革”的错误,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群众也以种种形式表示对“文革”的反对。这些历史事实,应该说出来。毛主席怎么样呢?“文革”是他发动的,但是应该说毛主席对“文革”也处于矛盾状态,他也有时发生反“文革”的倾向。开始他把邓小平当作第二号走资派,后来他起用邓小平,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最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是“四人帮”。毛主席用他们,但又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也是矛盾。毛主席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与美国恢复关系,这与“文革”一开始提出来的“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并不符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经常感到“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他想“收”,但是因为他并不放弃造成“文革”的基本观念,所以他就不能有效地控制“文革”,更不能结束“文革”。他起用了邓小平同志,然后又反复。虽然批评“四人帮”,但不能抛弃他们。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

再说一下那四年中的前三年,即1966年到1968年。历史决议称这三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年,对1966年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错误。在这

1958年间,开始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错误,到1960年左右国民经济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指出:“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还有所发展。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有成就,也有错误,而这些错误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平空发生,它的前身是有根子、有基础的。“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做法是彻底改正过去1958年中的“左”的错误;另一种做法是,只把“左”倾错误发展到“文革”那样极端的情形改掉,再回到“文革”前的路子上去。后一种作法显然是危险的。“文革”前1958年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小平同志认为这样做不行,要接受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外找出新的路子来。改革是针对1958年错误的,不是简单地改掉一个“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把“左”的指导思想根本改掉。这样讲,并不是把“文革”前1958年与“文革”混为一谈。应当指出,“文革”前1958年我们有很多成就。“文革”后走出的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实际上在前1958年中已经有了一些苗头。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论述过这个问题。在前1958年,毛主席自己,还有其他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陈云同志等,都有许多与当时的作法有些矛盾的新的想法。他们觉得完全照抄苏联的办法,以及完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行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新路来。如在1958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本来“左”的片面性很严重,到三年困难发生后,他亲自到安徽农村看,认为这样搞下去不行,就提出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主张。他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为此他在1959年后遭到批判,省委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了。曾希圣同志可算是最早提出家庭联产责任制主张的一些同志中的一个。所以,1958年后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许多问题在1958年前已经有人通过实践感觉到了。而且那1958年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社会主义建设再起步的基础。那时已经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我们决不能对“文革”前 17 年不去好好地研究。讲党史,不去好好讲这一段,是十分可惜的。不讲清楚这 17 年,就没法说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为什么会有改革开放。既然犯了错误,就要变成明白人,懂得错误是怎么来的,这样以后才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我们一定要善于很好地利用建国 17 年来党史的经验教训。这是财宝,包括犯错误的经验也是财宝。不利用错误经验,把它当财宝,那错误就白犯了。所以我认为,这 17 年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搞清楚这段历史,才能在今后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 乔 木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8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①。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6年的18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1958年的“左”倾错误。1958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18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18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

* 本文是作者1984年1月至1985年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

① 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年增长速度是:

1953—1957年(基期1952年):工业15.6%,农业10.4%。1961—1965年(基期1960年):工业15.6%,农业10.4%。1978—1982年(基期1977年):工业15.6%,农业10.4%。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 17 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 also 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 1976—1978 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 1959 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 1949 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8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59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19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

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 1956 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6 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和不断革命。在 1956 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

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 ~~1954—1956~~ 1954—1956 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1954~~ 1954 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1954~~ 1954 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1954~~ 1954 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 ~~1954~~ 1954 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

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

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 1955 年上半年和 1956 年至 1957 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 1957 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 1959 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 1959—1960 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0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①。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 1949 年—1956 年的中国，特别是 1956—1959 年的中国。1956—1959 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 1949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

① 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 1960 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